

中華文明史



中华文明史

第九卷

清代前期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韩新保

书名题字：周谷城

装帧设计：邓汝燧

中 华 文 明 史
第 九 卷
清代前期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59 印张 1,180,000 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定价：49.40 元

ISBN 7-5434-2054-6/K·49

《中华文明史》顾问、学科主编、副主编

(以学科为序)

顾问 周谷城

中国政治史	主编	陈哲夫	副主编	袁刚	
中国经济史	主编	许大龄	副主编	高寿仙	
中国法制史	主编	张晋藩	副主编	王宏治	李建渝
学术文化思想	主编	步近智			
中国教育史	主编	毛礼锐	副主编	乔卫平	程方平
中国科技史	主编	薄树人	白尚恕		
	副主编	杜昇云	范楚玉		
中国军事史	主编	张一文	副主编	曲爱国	刘庆
中国宗教史	主编	牟钟鉴	副主编	张践	
民俗文化史	主编	钟敬文	副主编	林永匡	陶立璠
民族文化史	主编	陈述	副主编	张璇如	
中外文化交流	主编	沈福伟			
中国文学史	主编	郭预衡	副主编	郭英德	
中国文字史	主编	赵光贤	副主编	王宁	彭林
中国史学史	主编	瞿林东			
中国美术史	主编	张仃	金维诺		
	副主编	李松	薛永年		
中国建筑史	主编	孙大章	副主编	傅熹年	于振生
中国音乐史	主编	冯文慈			
中国舞蹈史	主编	王克芬	副主编	苏祖谦	
中国戏曲史	顾问	张庚			
	主编	余从	副主编	常静之	
中国体育史	主编	赵玉亭	副主编	林伯原	

《中华文明史》编纂工作委员会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祖武 齐吉祥 乔卫平 李文姗 李 凭
李自修 张春富 张瑞安 张安奇 杨汝戩
袁 刚 鲁仲文 彭 林

总监纂：乔卫平

《中华文明史·清代前期》(第九卷)总纂、撰稿、配图人员

总纂:陈哲夫

总纂组成员:江荣海 吴 丕

撰稿人:

卷首语 陈哲夫

政 治 吴 丕

法 律 张晋藩

军 事 张德骥

经 济 高寿仙

农 业 范楚玉

手工业 何堂坤

数 学 郭世荣

天 文 杜昇云

地 理 宋春青

生 物 彭奕欣

医 学 朱建平

建 筑 孙大章

教 育 乔卫平

学术思想 步近智 张安奇

语言文字 章 琼 胡增益

史 学 瞿林东

图 书 王 艺

少数民族 张璇如

风俗文化 林永匡 王 熹 江荣海

宗 教 牟钟鉴 张 践

文 学 郭英德

音 乐 冯文慈

舞 蹈 苏祖谦 王克芬

戏 曲 常静之

美 术 赵 力 祝重寿

体 育 林伯原

中外文化交流	沈福伟	
配图总设计	齐吉祥	席育英
本卷图片主编	毛佩琦	李晓兰
本卷编图助理	林谟谐	陈建国

前 言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同仁,一直希望看到一部直接表现“中华文明”主题的大型学术著述问世。但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决非一二人力所能及。学界虽不乏良史之才,然而见仁见智难臻一体。欲将横贯九州方夷,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灿然著在简册,克备一家之史,实非易事。因此,这一选题一直无人问津。大型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的问世,正是试图弥补这一空白,实现海内外学者多年的夙愿。

中华文明彪炳寰宇,震撼古今,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如何表述中华文明这一历史主题,在中国学术界仍是一个新的题目。如果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中华文明,可以不去深究“文明”自身组合的要素及其相关性的联系,但作为一部专门表述中华文明这一历史主题的著作,则必须予以一一说明。

首先,“中华文明”是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主体脉络及其总体水平,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范畴,以及二者兼有的自然生存环境。其次,《中华文明史》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此外,某些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历史现象,也被看作是文明自身矛盾性的表现形式。譬如: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破坏或毁灭了文明,但战争本身又是文明的产物,战争的理论、艺术、手段等等,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战争在开创新的文明,以及促进区域性文化的迁移、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现象,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必须指出,中华文明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但它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其水平有时相去甚远,以至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若干地区或民族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水平。因此,我们把某些少数民族的区域性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边缘性文化或分支。至于史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区系文化,虽不能划入严格的“文明”概念之中,仍应作为中华文明的源

头加以探求。上述诸点，是本书表述中华文明这一主题时所遵循的原则。

在学术界，如何把握和概括中华文明的总体特征，始终是一个难题。它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化自身，而且涉及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因而极其复杂。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史前和先秦时期，多元的区域性文化的色彩非常鲜明，这一特征与诸多历史因素相作用，促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其后，以秦代大一统的中央帝国为开端，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才逐步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这种趋同性都是十分明显的。西汉以降，儒学在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平等竞争的机会大大减少了，社会思想领域相对沉寂，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具有多元性文化特色的作品依然不绝于世，并在文化领域里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宗教、哲学、文化艺术领域中非儒学化的现象，也是始终存在的。毫无疑问，由于数千年中外文化的交流，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和融合等等因素，汉族文化从周边文化中吸收了很多营养，因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而非原初相对单一的性状。今天的中华文明正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汇合而成的滔滔大河。

就总体而言，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较为清晰，而且几乎每朝每代都有明显的兴衰更替之迹。中国古代的修史家，也一向注意总结先朝的治乱得失，以为时人明鉴。除此大端之外，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身形成、发展、衰落的规律及特征，它们虽然受到社会文化大气候的影响和制约，但并不都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同步。这就造成了在社会历史总体兴衰过程之外的广义文化领域中，呈现多重起伏交错的状态。客观描述这一历史状态，并探求形成这一状态的原因，是本书既定的写作宗旨。本书的另一宗旨，是力图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概括和反映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同时又要正确对待中华文明的得失长短，既不盲目拔高，也不无端贬抑，以实事求是为宗。

编纂大型的中国历史著作，还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史学界为此而长期聚讼不已。为了突出文明的主题，本书采取淡化分期纠纷的原则。一方面，用一定的模糊性，粗线条地勾画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而不囿于特定的阶级集团斗争及“五种社会形态”的成说。另一方面，采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说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1. 原始社会：史前时期；2. 古代社会：夏商周三代，其中，春秋战国时期为古代社会向中世纪社会过渡的时期；3. 中世纪社会：以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制国家为开端，至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政体为终止；4. 近代社会：以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政体为开端。

其次是对历史人物的处理。本书不为历史人物单独立传,而是把他们放到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中去叙述。以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为本位,个人生平为依从。

再次,史书内容的交叉与互见,也向为学界争议。司马迁著《史记》,往往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因而被一些学者诋为所短。但也有学者认为,《史记》叙事前后屡出,纪传互见,可增加读者接触历史事件的机会,并从多种角度和场合表述同一历史事件,可以使人产生对于历史的主体感受。多层次、多角度地描述和剖析同一历史现象,也是本书既定的写作宗旨。其目的在于,阐发同一历史现象中所蕴含的不同文化要素,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综合理解。

在确定直接表述“中华文明”这一历史主题之后,以何种体例将众多文化现象组合在同一主题形式之中,并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我们既不能率由旧章,又要充分取鉴前人著史之长。本书参考通史惯例,按历史朝代的自然顺序划分卷数,全书共分十卷,分别为:第一卷:史前时期;第二卷:先秦时期;第三卷:秦汉时期;第四卷: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五卷:隋唐时期;第六卷:宋辽金时期;第七卷:元代;第八卷:明代;第九卷:清代前期;第十卷:清代后期。各卷的章目设计,力图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题,并尽量反映不同文化类型在同一时期相互组合的基本格局。当然,本书所设二十余个学科文化,也只能是求其大要,不可能囊括一切。

《中华文明史》是集体协作的成果。在编纂过程中,百余名专家和学者,跨越数十个专业学科领域,坦诚相待,通力合作,实乃我国学术界之盛举。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画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体育学院、苏州大学、北京图书馆等数十个院校系所。

本书作为海内外第一部大型的中华文明史专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的许多人士为本书的编纂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著名学者周谷城、季羨林、张岱年诸教授为本书题写贺辞,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涉及内容广泛,而编纂时间又比较短促,纰缪或意有未逮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1989年4月

卷首语

本书涵盖从1644年清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约200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朝皇帝的统治。其间，康、雍、乾三朝约120年的时间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嘉、道以后开始衰落。

清代前期，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清代统治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数不多的满族人统治人数极为众多的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这一特点使得满洲贵族统治者心存疑忌；满清贵族虽然于建国初联合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镇压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但阶级斗争一直比较激烈；此外，在统治集团内部，还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斗争。为对付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于是，清统治者极端地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得这一时期的集权专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程度。其专制在思想领域里则集中表现为文字狱，以此残酷地迫害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

清代前期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取得的。斗争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民族压迫和民族融合同时并进。清统治者为了显示其淫威，对汉族人民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压迫。然而，既要统治汉族，就得同汉族打交道。满洲以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便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汉化，从而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一步。其次，清统治者的极端专制统治和人民的反专制斗争同步进行。清王朝的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是极为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野蛮屠杀，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恨。即使在统治稳固时期，人民的反清斗争也日无间断。人民的反清斗争迫使清王朝统治者在武力镇压人民的同时，也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如康熙帝废除“圈地”制度，实行蠲租免税的政策，并非心甘情愿，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统治者被迫实行一些让步政策，赢得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

清代前期诸帝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注意兴利除弊，从而也推进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例如康熙帝就非常留意明朝的历史，时常翻阅《明实录》，而且重视《明史》的编修。他认为明末“宦寺朋党交相构陷”、“臣子背公循私，处言路者变易是非”、“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他把这些作为自己的鉴戒，并采取措施，大力矫正前代之失。他比较注重实务，努力修明朝政，整顿吏治，奖励廉能，惩治腐败，十分警惕阉宦朋党为祸。雍正与乾隆帝也都有类似的作风。因而在清代前期革除了明代末年阉

宦乱政、大臣专权、朋党祸国、狂征苛敛的种种秕政，为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另外，作为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代表，清代前期的几朝皇帝并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以北方民族特有的洒脱胸怀和积极进取精神，在仰慕汉族文化的同时，更潜心研究汉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突出标志之一的儒家思想被他们全盘接受，并继续作为正统思想以指导政治实践。他们还延聘汉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他们出谋划策，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安民的政治经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国疆土的扩大为清代前期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证明，凡是多民族的团结得到巩固、多民族的国家实现了统一的时候，中华文明就会前进，反是就会停滞或倒退。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建立起来以后，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最大利益是国家的统一。适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清王朝统治者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从康熙帝到乾隆帝先后扫平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平定了噶尔丹叛乱，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等等。清代以前的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长期有效的统治过。国家的统一，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文明能在清代前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16、17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英等国先后将殖民的触角伸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殖民地，腐朽的明王朝无力抵抗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有力地阻止了这种形势的发展，殖民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在中国轻举妄动。康熙帝对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的斗争，与沙皇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东部边界，都表现出了大国的气概。

清代前期的中国，是以一个东方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明对周围国家有很强的吸引力，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关系。东方国家之所以愿意同中国交往、学习中国文化，是同中华文明中的仁义礼让、济危扶困、友好睦邻、和平相处等精神分不开的。这与当时一些殖民主义国家的作法截然不同，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中值得肯定的一种精神。

中华文明，于清代前期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不少方面处于落后的地位，但在纵向比较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历史之后仍可看出，它在很多方面还是前进的、发展的。

清代前期的经济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以后，达到了持续的繁荣。经济的持续繁荣与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不无关系。清初的总人口约1亿多，18世纪中叶达到2亿，19世纪中叶更突破4亿大关。在人口的挑战面前，清政府只得不断调整经济政策，鼓励垦荒、减轻赋役，废除贱籍，推动移民，这些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因此，在清代前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都大大超过了前代。经济的空前繁荣虽然奠定了大清帝国在东方的大国地位，但是在世界的格局中，他的经济结构已经落后。此时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代表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

“经济起飞”，而中国的繁荣只不过是“经济增长”。尽管如此，清代前期的经济发展也在某些方面对传统的经济结构有所突破。在农业上出现了商品性的经营，工场手工业则出现在采矿、冶铸和井盐等工业中；清代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的活跃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兴的商业性城市的出现，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概括起来说，清代前期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个“传统内变迁”的过程。

在科学技术方面，清代前期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随着西学东渐的继续，加之康熙帝和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对西方科技采取欢迎、学习的态度，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刻苦钻研，致使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地图测绘、建筑、医学等方面都取得相当的成就和进步。《时宪历》是一部应用西洋法数而保留旧历结构的历法。它的颁行标志着欧洲天文学的精华已被我国所吸收，这是我国最早接触近代科学的领域，对天文学和农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王锡阐以兼采中西的科学态度，通过长期实测和钻研，首创“太白食日法”，还提出一种正确计算日食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方法。数学家梅文鼎创造了球面三角形的图解法，而且提出了当时尚未从西方传来的各种等面体体积的计算方法和原理。从康熙四十七年开始实测到康熙五十七年绘制而成的《皇舆全览图》，李约瑟博士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以故宫为代表的清代宫殿建筑，以圆明园为代表的清代园林建筑与设计，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清代的医学，无论是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方面，还是在药物方剂学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在这个时期，学术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曲折地得到发展。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一时间，民主意识、平等观念、自由呼声等曾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一个很有希望的浪潮。但是由于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网遍于国中，很快就使得中国大地万马齐喑。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而仍劳作不息，通过不同的形式推进了学术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进步和发展。他们或提倡实学，批判空谈心性的理学、心学，宣传经世致用的学风，为后人播下思考、探索、追求的种子；或潜心汉学、训诂文字、整理古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乾嘉学派；或在政府的组织下，参加图书的编纂整理，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都在这一时期完成；或用较为隐蔽的文学体裁，以喜笑怒骂的笔调，刻画社会的黑暗污浊、官场和科场的腐败虚伪，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或“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揭示封建制度的腐朽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桃花扇》则是这些文学作品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此外，地方戏曲的兴盛、书法绘画的繁荣，都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

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优秀的中华文明使欧洲人大为赞叹，在德、法、美等国家中掀起一股不可遏制的中国文化

4 中华文明史

热。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兹、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等人都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看作是欧洲国家应学习的榜样，中国儒家的政治学说成为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的武器。另外，大批华侨漂洋过海，也为中华文明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总而言之，中华文明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仍有较大程度的进步与发展，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仍是一支强大的、有生命力的文明，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然而，清代前期的中华文明，毕竟属于封建时代的文明，它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封建时代的印记，诸如对进步思想的压制和摧残，对经济革命的限制和打击，对世界交往的消极和闭关自守政策，都大大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华文明能否继续发展，将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乞巧图(局部)

纵 28.7 厘米,横 384.5 厘米

清 丁观鹏绘

图中描绘贵族妇女在夜间庭院中燃烛斋供的情景

上海市博物馆藏



盲人说唱图

纵 88.5 厘米, 宽 62.2 厘米

清 金廷标绘

故宫博物院藏



苗族舞乐图

清

选自《广舆胜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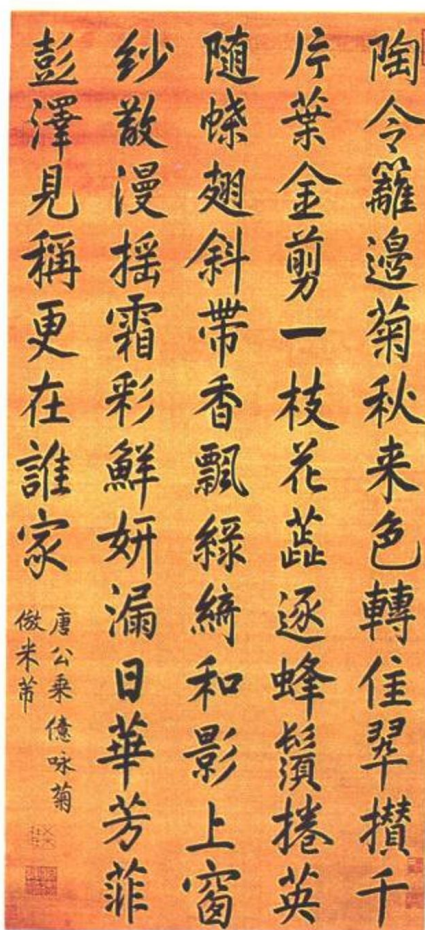


仿黄子久山水图轴

纵 151 厘米,横 66 厘米

清 王鉴绘

辽宁省博物馆藏



康熙帝仿米芾字轴

清

康熙帝最喜好临摹宋米芾和明董其昌的书法。此书轴名为仿米芾,其实在结构和布局上更接近董其昌的风格

故宫博物院藏



枯兰复花图卷(局部)

纵 32.6 厘米,

横 1034.5 厘米

清 王铎绘

此图是顺治六年(1649)为宋权而作

苏州市博物馆藏